

《榆枋齋學林》（上、下）

虞萬里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1 月。
6+1107 頁。

顧濤

北京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書
評

一、浙東

經學研究，今尚難遏落寞之勢，蓋三百年來羅網未能決破之故也。三百年前，清學趨於鼎盛。

對清學作規模化梳理，發軔於章炳麟（1869–1936）之〈清儒〉（1902）。章氏以乾嘉之統系創關於顧炎武，分庭為吳、皖二宗，吳派「皆陳義爾雅，淵乎古訓」，皖派「皆參密嚴瑣，上溯古義」，此二者所長；然細玩章文，終難泯其「樸學殘碎」之心跡。¹數年之後，章氏在予其高弟吳承仕的手札中，極論二派之弊在於「敦守舊貫」，「香集舊事」，「繁言碎義」，「蹈常襲故」。²章氏正反兩說，學界均承而續之。

梁啟超（1869–1936）接棒〈清儒〉正面之論，重在發掘樸學實事求是的考證風格；³錢穆（1895–1990）則洞悉章氏所陳之弊，在後出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梁同名之作）自序中明確指斥：「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為消遣神明之林囿。」⁴職是之

1 章炳麟著，徐復注：《馯書詳注·清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42、145、151。

2 章炳麟 1911 年 10 月 14 日致吳承仕書，《吳承仕藏章炳麟論學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 年），頁 6–7、347–348。

3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921）、《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26）二書。

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2。

故，錢先生在清代「考證之學，乃專趨（顧）亭林博學一邊」的洪流中闢出浙東學派一脈，為其論評之繩尺，錢云：「浙東史學，遂皎然與吳、皖漢學家以考證治古史者並峙焉。」⁵又云：「自章氏（學誠）之論出，則顧氏（炎武）之說自破，而吳、皖學者考覈古訓、古禮之精神，亦且廢然而知返也。」⁶在錢著《近三百年》中，已斷然撇去段（玉裁）王（王念孫）、王（鳴盛）錢（大昕）等之蹤跡。其實，梁啟超在早年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04）中粗言清學崖略，亦何嘗不曾有「吾於諸派中甯尊浙東」⁷之說？可惜，此後梁氏未嘗深發。

浙東學術之精蘊，自當以章學誠（1738–1801，紹興會稽人）所揭為典要。章著《文史通義》特置〈浙東學術〉一篇，溯其本人學承黃宗羲（1610–1695，紹興餘姚人），直宗王陽明（1472–1529，紹興餘姚人），治學旨歸在於：「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⁸錢穆釋章氏之意曰：「浙西講經學，浙東重史學，實齋《文史通義》唱『六經皆史』之說，蓋所以救當時經學家以訓詁考覈求道之流弊。」⁹當時經學家，即聲勢隆盛的吳、皖兩派，明標經學，實則終身溺於小學，抑或文獻、名物，在崇古求真的高帽底下，爭持門戶，或迂腐自矜，或誇媚取榮。此與班固當年所譏「碎義逃難，便辭巧說」之習，¹⁰可謂異代不同時。在此意義上，浙東一路，立心在史學經世，固在深砭而力祛俗弊，期將經學拉回政事章制、人倫日用的軌道。此途下啟黃以周（1828–1899，寧波定海人），直迄孫詒讓（1848–1908，溫州瑞安人），清季終以浙東經史為收束，而黃、孫為殿軍。「樸學」之架鑊，又何其能概之？

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二章「黃梨洲」，頁35。

6 錢穆：《國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九章「清代考證學」，頁299–300。

7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冊1，頁96。

8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5〈浙東學術〉，頁523–524。

9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九章「章實齋」，頁430。

10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30〈藝文志〉，冊6，頁1723。

惜哉！章逝二百年，孫歿一百年，高標「無用之用」¹¹的考證之風再度甚囂塵上。想三十年前，京都學者池田秀三慧眼有識，寄言云，由王念孫至王引之，「捨棄大道，以小學本身為終極目標」，「其學問性質乃反經學或脫離經學的」，¹²其言在昔而意在今。中國學界，沉迷日深，於此東瀛來風，置若罔聞。特立而傲雪於當代學壇者，筆者願推浙江紹興虞萬里（1956-）。虞先生長年浸淫經史，樹風先賢，十多年前即以榆枋齋之名聲馳學壇；三年前，〈緇衣〉研究專著成，¹³筆者見而驚呼「新經學之冰山一角終於浮出水面」；¹⁴今再睹其十多年來論作之彙集凡120萬言，¹⁵心跡肯綮，果然首尾俱見。筆者撫讀月餘，昭然可見冰山之根基底層，正是那綿延如縷的浙東氣韻。故試為抉隱，曉諸學界。

二、功力

虞先生與王、黃、章的籍貫同屬紹興，此乃表像上的聯繫。日人山口久和曾敏銳地發現，近年來像《浙東學術史》這樣的著作，曾逐一條理紹興、寧波、溫州等八府的所謂浙東地區學者，但其中一大批「一個也沒有被章學誠容許記入他的『浙東學術』系譜之中」。¹⁶真正的浙東氣韻，端在於以史法治經學，即《文史通義》開

11 「無用之用」，出自《莊子·人間世》。近代自王國維重提之後，影響至今，然究其原委，亦以誤讀王說者居多。參見王國維〈國學叢刊序〉：「余謂凡學皆無用也，皆有用也。……世之君子可無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觀堂別集》，卷4，收入《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冊3，頁206-208。

12 池田秀三著，石立善譯：〈訓詁的虛與實〉，收入《中國經學》第五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

13 虞萬里：《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

14 顧濤：〈評虞萬里《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漢學研究》2011年第29卷4期，頁325-332。

15 虞萬里：《榆枋齋學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下文凡引錄此書，簡稱虞著，且僅隨文夾注頁碼。

16 山口久和著，王標譯：《章學誠的知識論——以考證學批判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46。

篇所謂：「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¹⁷ 虞先生之所承，適在此。分而言之，厥有二端。

其一，章學誠云「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¹⁸ 故發掘經義，貴不空言說教，而能以歷史實證服人。虞著研《書》、《詩》、《禮》者各 4 篇，又《詩》、《禮》交織者 1 篇，均採用此法。姑舉前三篇考索相傳偽古文《尚書·咸有一德》為例。〈咸有一德〉為創論中國君臣之道的名篇，孔傳謂此篇「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至唐宋時人尚深具信仰：「夫一德之所在，天之所以在，民心之所在也。有此一德，天必祐之，民必歸之。」（虞著引張九成語，頁 37-38）此篇的積慮產生於宋以後，尤其是清閻若璩、惠棟為首，由漢代所生篇次排列的分歧，連及篇中經句文辭逐條大加糾彈，宗旨在證此篇為偽作。由此，〈咸有一德〉地位驟降，篇中所蘊經義掃地。虞先生則反其道而行之，藉由清華簡〈尹誥〉的公佈，重新求證此篇所牽涉的各大疑慮癥結，使得鉛華盡褪，珠璣露面。虞先生的貢獻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

（1）對「一德」本義的歷史考證。此篇的滯漲與「一德」自孔傳以來被誤解為「純一之德」，有很大關係。虞著指出，在周代以前一德所指實是「成湯網去三面獨留一面之德，亦即仁愛之德」（頁 50），伊尹稱頌商湯的，正是在田獵時網罟僅設一面的具象可見之德性，至春秋以後由此普遍化為抽象的「仁德」。由「一德→仁德」歷史變遷的解釋理路，衝破了陳陳相因的「純一之德」說，可謂發千古之覆。虞說是建立在擁有《呂氏春秋》的直接證據（頁 49），以及對「一」、「德」、「仁」三個關鍵詞進行大量的歷史語言學實證的間接證據之上（頁 42-48，51-54），令人悅服。《尚書》此篇關涉中國道德論的源頭，之所以被列為「經」，厥意可見。

（2）對〈咸有一德〉性質的推闡。虞先生更由考釋此篇成書時的「一德」本義，進而下推，對此篇的流傳，一直到漢孔安國作傳，魏晉間編定成今本的歷史全過程進行實證性追溯。從體式上推定清

17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 1〈易教上〉，頁 1。

18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 1〈經解上〉，頁 94。

華簡〈尹誥〉是經，〈咸有一德〉是漢代孔安國（或其後學）所作推衍闡發經文的傳，今傳本則是魏晉以後人所編成，大失原貌。虞著排出孔傳本十二簡之舊觀（頁 33–34），以及今本如何為整理者所錯簡之最大可能性，由此使此篇的歷史演進纖縷畢見。閻、惠等為牽合偽書說所下的大量繁碎死工夫，今跳出井底，便可不攻自破。虞先生的經學研究法，將構成一種新範式。

其二，章學誠云「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¹⁹ 故研治經學，貴不拘執經句，而能縱橫四部，多方採銅。虞先生的經學造詣，恰恰在於能以開放的心態，納各類史料於一爐而求其貫通。在虞著中，有兩大制度史專題，一是避諱起源，二是姓氏源流，前者是宗教禁忌的禮制外化，後者是宗法血緣的隱性標記，均是由經學而生發出的史學大課題。虞先生研究避諱，自 1990 年抄錄卡片，到 1993 年成稿，2006 年修訂，期間所下工夫可知。今藉〈商周稱謂與中國古代避諱起源〉一文可窺得其中所引錄史料，除先秦經史全部文例外，尚有甲骨、金文、考古實物、民族志、外族調查，以及清代、近現代學者從制度史、人類學上所展開的大量研究成果。該文篇幅百頁有餘（頁 555–663），出示引文出處的注釋不下三百條。僅就其中所採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掘報告為例，包括陝西西安半坡、寶雞北首嶺、臨潼姜寨、華陰橫陣、甘肅臨洮寺窪山、秦安大地灣、四川大溪、山東膠縣三里河、遼寧喀左東山嘴、浙江良渚等，富贍非常人所及。尤可寶者，文中引用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和法國波爾多第一大學兩位人類學教授，對法國東南部黎凡特地區距今八萬至十萬年前的墓葬特徵的研究報告，²⁰ 證明「鬼魂觀念與墓葬、巫術幾乎同時產生，目前可上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頁 656、661），中西相貫，讓人拍案叫絕。

19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 1 〈原道下〉，頁 139。

20 Ofer Bar-Yosef and Bernard Vandermeersch, "Modern Humans in the Levant." *Scientific American* 268.4 (1993). 郭敏中譯文，《科學》1993 年第 8 期。

對姓氏的研究，虞著共入收五篇，²¹ 大致自 2000 至 2011 年，基本上延續避諱研究之法，大量採用先秦各類資料，以證明周代禮治的要素：「分封（大封同姓）是擴展與控制，宗法是聚權與收族」，由此「凸顯姓之重要性（標誌血緣），以達到姬姓大同、長治久安的政治目的」（頁 988–999）。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專題下，虞先生考索的範圍大大擴展到秦漢以後，自《世本》之〈氏姓〉篇，沿東漢（王符、應劭 2 家）、六朝（《姓苑》等均逸）、唐（《姓纂》等）、宋（5 家）一路下來，直至明（4 家）清（4 家）、現當代（6 家），古今姓氏書可謂網羅殆盡。行文的表面是學術史的梳理，而內地裏透露出的，正是作者為鑽研這一專題，於史料涸澤而漁的貫常風格。

利用近年來新發現的材料，似已成為史學預流之共識，不過大多只是慕名蜂擁而至，冷飯熱炒與牽附鑽營者居多，正章學誠所斥為「竹頭木屑之偽學」。²² 而虞先生則立心在經學，其研究簡帛鈔本，已然獨樹一幟，風格卓異。依託新材料，往往能使經學史上諸多爭訟千古的硬骨頭，化解於無形。此於其簡本〈緇衣〉研究，已然盡現，且獲得了學界的贊譽。²³ 為一清眉目，筆者將虞著中詳論的數種經部新材料臚列於下，其突破之所在，不煩詳述（第一條上文已述）。

新見史料	篇名編號	地點 (公佈時間)	史料 時代	涉及文獻 (或史事)	突破點
清華簡	第一冊〈尹誥〉	入藏清華大學 (2010)	戰國	古文《尚書》 及孔安國傳	經義、經傳 體式
上博簡	第一冊〈孔子詩論〉	入藏上海博物館 (2001)	戰國	《詩》孔門之傳	經義、經傳 體式

21 此五篇分別是：〈孫詒讓《廣韻姓氏刊誤》推闡〉（卷上）（2000）、〈《廣韻》姓氏來源與郡望音讀研究〉（2008）、〈先秦至唐宋姓氏書之產生與發展〉（2010）、〈明清以來之姓氏與姓氏書〉（2010）、〈姓氏起源新論〉（2011）。

22 章學誠著，倉修良編：〈與邵二雲書〉，《文史通義新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548。

23 虞萬里《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獲得首屆清華大學李學勤中國古史研究獎三等獎（2013.6）。

郭店簡	〈緇衣〉篇	湖北荊門郭店 (1998)	戰國	《詩》三家說	漢代經學傳授脈絡
熹平石經殘石	《魯詩》136塊	河南洛陽出土 (1921–1957)	東漢		
吐魯番文書殘片	《吐魯番出土文書》60TAM332:9/5	新疆阿斯塔那332號墓 (1996)	唐	《春秋經傳集解》	唐代《春秋》傳習
	大英圖書館東方部館Or.8212/979a	新疆吐峪溝 (2005)	唐	《切韻》	唐代韻書傳鈔
黑城文書殘葉	《黑水城出土文書》F43:W1, F90:W1–3	內蒙古額濟納旗亦集乃路 (1991)	元	袁俊翁《四書疑節》	元代「四書」傳習
上博藏稿本	清沈大本《禮記訂譌》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未刊印）	清	《禮記》	漢代經書傳鈔
	《齊魯韓三家詩釋》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2008）	清	《詩》三家說	漢代經學傳授脈絡

三、性情

讀虞先生書，見其於四部典籍、紙本遺跡如數家珍，常歎其淹博多識為難能，此固其學養功力所在。然更據章學誠「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之說，²⁴若僅限於宏博，尚無以得窺虞著之心。

浙東之學非鄙棄博雅，而要在於博雅的考證中透射出一貫之道，余英時（1930–）曾借用英哲伯林（Isaiah Berlin）「狐狸」與「刺猬」的譬喻，來說明這一問題：「『狐狸』正似實齋筆下的博雅考證學家，而『刺猬』則運用『別識心裁』以成一家之言的『專家』也。……『狐狸』知道很多的事而缺乏一個中心系統來貫穿它們，則這許多知識便都沒有意義了。」²⁵那麼，刺猬用以貫穿學問的中心系統究竟是甚麼？章學誠有明確交待，章云：「善言天人性命，未有

24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5〈浙東學術〉，頁523。

25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頁83–84。

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²⁶ 所謂「六經皆史」，所謂以史法治經學，「正以切合當時人事」最為可貴，用錢穆的話說，就是「注意於文獻人物之史」。²⁷ 虞著之所得力者，正在善於透過文獻追蹤歷史人物。

能顯豁體現虞先生這一用心的，便是考辨《正統道藏》的主纂者為任自垣，由此徹底清算了盛行學界六十多年的張宇初說。《正統道藏》乃道教經籍之淵藪，若連纂修者都無法考實，則整套叢書就如同斷線的風箏，其資料來源、取舍精粗等大關節均是模稜兩可的。虞先生自 1983 年以來即沉潛於道經，此積鬱哽於胸中，二十年後機遇橫空出世——尋覓到新材料明成祖〈道藏經序〉（2000 年公佈），由此熔鑄新思，編輯相關史料，將《正統道藏》的纂修經過進行徹底的清算：任自垣為總裁，吳大節、涂省躬、林剛伯為重要纂修人員，另有王利用、姚宗禮統領鈔錄，時間在明永樂十七年至二十年（1419–1422），大致完成；此後，又由邵以正於正統九年（1444）領導校正、修訂，歷時同樣為三年而最終藏事。這部道經總彙，今已層壘疊壓為一個佈滿褶皺的平面，經虞先生的錦心妙手，其成型的立體格局，其間委婉曲折的人事動態，可謂歷歷在目。由此一來，被現代道學名家陳國符、胡道靜、李養正等普遍接受，又收入《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道教大辭典》、《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權威工具書的所謂「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及其弟張宇清編修」之說，完全落入子虛烏有。虞先生的這項工作，將改變學界對於《道藏》的基本認識，這一段道教史將有必要予以改寫。

諸君請留意，虞先生之措心道經，且能取得如此一網打盡的成績，絕非無心插柳所能致。儒道二家自孔子問道於老子的源頭上看即密不可分，漢魏以後交織之程度更熾，且逐漸融入民生日用。如果借用魯迅的名言說「中國根柢全在道教」，²⁸ 可以想見，不能打通

26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 5〈浙東學術〉，頁 523。

27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二章「黃梨洲」，頁 35。

28 魯迅：〈致徐壽堂〉（1918.8.20），見《魯迅全集·書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冊 11，頁 365。

三教壁壘，穿穴於儒家經句，亦不過是變相的文獻學，實不足以經學相埒。

一部典籍的水準與得失，從內容到編訂到鈔錄，和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每一步決策、每一項變動均有不可分割的緊密聯繫，這便是史心在人的真諦。依着這一路徑，細讀虞著考實《永樂大典》、《康熙字典》兩部大書的修撰人員及經過始末，甚至對獻《古文尚書》者梅賾、《近思錄》編纂者呂祖謙、持論王肅偽造說的正反諸家等的辯證剖析，自可得異曲同工之妙。

這一路數發揮到極致，便是對五經如何成為今貌的立體回原。鋪平為同一平面的今傳本任何一種典籍，均已將隱藏其背後的各個時期的人為因素疊壓起來。如果能將這些歷時因素予以充分離析，一一揭窺，附着在經籍表層的神秘光環便將逐步清除，回歸到的將是經義的原生態。虞先生是這一領域有意識的拓荒者。茲以虞著研究漢四家詩傳授為例。今傳本《詩經》充其量只是漢代以來四家傳承中的毛詩一脈，大非漢代三家詩（齊、魯、韓）之主流。清代以來朱士瑞、陳壽祺父子、王先謙等沿着乾嘉考據的路子做了大量輯佚和歸派的「窮年累月的蛾術專研」（頁 257），呈現出了《詩經》早期傳承中各種異文，但滯於各類原因，他們分析的正確率僅達到 34.9%（頁 149）。虞先生在清人的基礎上，利用新出土的石經、竹簡，對先秦經籍由成書到漢唐傳承的過程進行了嘗試性復原。基於「《詩》之文本在經典派系爭論攻戰和文字形體演蛻劇變之中，顛顛巍巍走過八百年，至唐《五經正義》及開成石經而始告定型」（頁 152）的歷史事實，首先，確定基本框架三大列：（1）經籍成書的春秋戰國，「言語異聲，則各國誦《詩》吟句，不免同句異聲；文字異形，則晉系、齊系、燕系、楚系之文字構形各有面目」；（2）經籍傳鈔的漢代，「各家師弟子傳授之際，弟子記錄時有方音方言，俗體別字，復又傳鈔率爾，錯譌橫生」；（3）毛詩獨行的六朝，「別體異構，俗寫草書，又興起新一輪異化與融合」（頁 151-152）。其次，進行 86 條個案細化考證，凸顯出在傳授、記錄、鈔寫過程出現差異的表面背後，是由語言的形、聲、義以及文本錯簡等所造成的一系列深

層原因。而這些都是某一個或某幾個人物個體的必然性（時、地）和偶然性（傳、鈔）因素所造成。這一路徑，可以虞先生對《詩·小雅》「裳裳者華」、「常棣之華」的「裳—常」字所作出的同聲符形聲字通假的字形分析為範例（參見〈由《詩論》「常常者華」說到「常」字的隸定〉一文）。在虞先生筆下，傳鈔過程中何以形成「常—棠—裳—棠—唐—嘗」的六種字形差異（異文組）的歷史因素，和盤托出，當年經師、鈔手們粗率不拘、倉促換字、苟簡趨省等心理，如同被「攝影機」般在千年後再度重現。

同樣的思路，虞先生也施諸於其他經籍，比如〈三禮鄭注「字之誤」類徵〉（收入虞著，6萬字）和〈鄭玄所見三禮傳本殘闕、錯簡、衍奪考〉（即刊於《中國經學》第12輯，5萬字）兩文，用力則在「三禮」。這項開拓，所依託的史料零散而細碎，要求研究者對殘留的蛛絲馬跡具有偵探般的敏感，下得起「上窮碧落下黃泉」的苦工夫；同時，又因時空懸隔、史料片斷，要求研究者具有豐富的歷史想像力，對人物心理進行高難度的邏輯推理。兩者缺一，稍有閃失，便可能與歷史的真相謬以千里；兩者結合，恰恰體現出研究者本人的學術性情。經學的研究，被開掘到古人的生活實態和內心世界，必將展現出非同尋常的活力。

由此反觀章學誠所說，「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²⁹ 史料的裁取，謂之功力；史識的裁斷，肇自性情。章又說，「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³⁰ 虞先生正因其學無門牆，不入家法，一任性情，概可謂得之。

四、文質

悉心虞著者，當不難看出，虞先生的學問一定程度上根柢於浙東之孫詒讓。就姓氏學而言，虞先生說，「自清季孫詒讓為作《廣韻姓氏刊誤》二卷，嗣後絕響」（頁472），由此引發出他本人一系列

29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2〈博約下〉，頁165。

30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2〈博約中〉，頁162。

關於姓氏起源的研究，竟而至於將其在聲韻、訓詁、文獻、地理、章制、甲金等領域的雄厚積累糅合為一。要知孫氏之學，上溯有清，廣博堪稱獨步，精深罕有其匹，最得乎「博雅」與「專家」兼擅之精蘊。1899年，孫氏歷二十七年撰成《周禮正義》之鴻篇鉅製，自序謂「閱意眇眇，通關變常」，「經世大法，咸粹於是」，³¹此19世紀學術考古之水壩閘。

旋至1901年，孫氏別撰《周禮政要》二卷成（初名《變法條議》），旨歸轉向捃摭中國政教「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³²融合之以中制為綱，西政為目，分設朝儀、宮政、教育、選舉及至礦政、水利、獄訟、西律四十途。此20世紀學術經世之洩洪口。

筆者仍願追蹤章學誠，其曾作過如下之天喻：「夫天渾然而無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黃道、赤道，曆家強名之以紀數爾。古今以來，合之為文質損益，分之為學業、事功，文章、性命。」³³為「文」的博雅，故當「風氣既弊，學業有以挽之」，孫《周禮正義》足以當之；為「質」的專家，故當「風氣未開，學業有以開之」，孫《周禮政要》洵為合轍。以學術史之大勢言，筆者期待虞先生的「兩漢經籍史」早日問世，剎住世風之日沉，此為文；更期待虞先生能於經籍之數度中抉出「學業將以經世」之大道，開闢經學之新生，此為質。文質相宜，彬彬君子；文質相勝，非史即野，朱子傾向於「與其史也，寧野」。³⁴虞先生摩挲千古文士別集（見〈別集流變論〉一文），歸宿於古來文集「能播在人口者，竟不及百一」，「以無關世道人心」（頁1051-1052）之故也。千年智慧，正可謂一朝相通。

31 孫詒讓：《周禮正義·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冊1，頁1。

32 孫詒讓：《周禮政要》（西安官書局，光緒甲辰，1904年），頁1。

33 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卷3〈天喻〉，頁310。

34 朱熹：《論語集注·雍也》，《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3，頁89。

